

2015 中国经济学家地理(湖南篇)

湘籍经济学家:远见卓识誉学界

湘籍经济学家是了不起的学术群体,从何廉到何炼成,从刘涤源到曾启贤,从尹世杰到杨小凯,都是成就非凡的学术大家,卓炯更是享誉九州的代表人物。

■ 白卫星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何廉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马寅初、刘大钧、方显廷齐名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被誉为“在中国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国内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

卓炯是我国最早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论者,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预言家,他提出的理论一再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他早在1961年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紧接着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经验证明,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超前于经济改革实践约30年。1979年卓炯写下了一篇重要论文:描绘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蓝图,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要破除价值规律的作用”。当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十多年后的90年代初期,中央终于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把传统的计划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再一次证实了卓炯的预言。

刘涤源和曾启贤一生从教,桃李满天下。

“西北王”何炼成,数十年来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为我国培养出张维迎、魏杰、刘世锦等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成就卓著。

以陈志武、邹恒甫和刘尚希为代表的湘籍学子,已经成为目前我国青年经济学家的主力,是拥有“60后”经济学家最多的省份。

【杰出人物介绍】

卓炯(1908—1987)1908年生于

慈利县,1931年考入中山大学教育系,后转入社会系,攻读政治经济学,受业于王亚南、何思敬、邓初民、周谷城、恽代英等进步教授,为后来的学术生涯打下基础。1935年获社会学学士学位。同年秋入广东海学书院,攻读研究生,研究明史。1936年至1938年,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广东民族抗日先锋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回中山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与王亚南共同钻研《资本论》。1950年5月任南方大学第一部主任。1953年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学习室副主任,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先后写出《政治经济学学习提要》、《十大经济政策解说》等专著,提出计划经济的基础是商品经济和商品价值规律。195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60年,任广东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副组长,在他起草的前言中阐发了物质利益的原则,因而被撤销副组长职务。1961年写了一组关于商品经济的论文。“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受到批判和凌辱。1973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恢复,他任副所长兼经济研究室主任。1979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他任副院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1979年4月,他向无锡全国学术会议提交《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论文。1980年夏,写了《把产品经济体制改造成商品经济体制》,明确指出:“当前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要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写了《试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试论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等论文。主要论著有《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经济学新探》、《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

济论》等。

刘涤源(1912—1997)1931年考入长沙市一中高师部。193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42年任1944年,任重庆大学商学院讲师,讲授货币与银行等金融课程。1944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专攻西方经济理论。1947年学成回国,回母校武汉大学经济系执教,任教授数十年。他是中国研究西方凯恩斯主义的著名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研究也颇有造诣,有所建树。50年代,开始研究“价值规律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运转”课题,撰写数万字的研究报告。1956年参加武汉大学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受到《经济研究》、《学术月刊》等全国性刊物的青睐。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身处逆境,仍坚持对学术的追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改正,重新回到武汉大学执教,继续从事原来的课题研究,与陈恕祥教授合作完成《垄断价格机理研究:垄断价格机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1996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了补充和发展,弥补了国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足,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何炼成于1947年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在名师指导下,他较为系统地学习了中外经济理论,为日后深入开展中西方经济思想打下了基础。1951年8月大学毕业,奔赴西北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何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从事数学和科研工作近半个世纪,除“文革”10年外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先后讲授过7门课程,受业学生近万人,其中博士生65多人,硕士生500多人,本科生5000多人。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和重视,大多数已成为骨干,成为各级领导,有的成为全国著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代表作品:《何炼

成选集》、《何炼成文集》。

尹世杰(1922—2013)194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系,留校任教,并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湘潭大学政治系主任、经济系主任、消费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消费经济学创始人。尹世杰教授第一个把消费经济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出版第一本系统研究消费经济的专著《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获第一届孙冶方社会科学奖,第一个招收消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创办第一个消费经济研究所,创办第一家消费经济专业刊物《消费经济》杂志。

★附:湘籍经济学家名单(排名不分前后)

杨端六(1885—1966)
刘秉麟(1891—1956)
何廉(1895—1975)
卓炯(1908—1987)
汤象龙(1909—1998)
刘涤源(1912—1997)
刘明夫(1915—1996)
曾启贤(1921—1989)
尹世杰(1922—2013)
杨凯文(1948—2004)
杨敬年(1908—)
黄万纶(1926—)
何炼成(1928—)
张守一(1931—)
成思危(1935—2015)
秦池江(1936—)
贺德江(1942—)
陈东琪(1955—)
孙祁祥(1956—)
国世平(1957—)
王志武(1959—)
陈东京(1962—)
邹恒甫(1962—)
赵凌云(1962—)
杨开忠(1962—)
黄少安(1962—)
刘尚希(1964—)

2015 中国经济学家地理(湖北篇)

鄂籍经济学家:学术创新著称于世

鄂籍经济学家的学术贡献是世界公认的,主要体现在学术大家多,学术创新多。

■ 白卫星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学术大家首推张培刚,他是从“将军县”——红安走出的经济学大师。1947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大卫·威尔士奖”,该文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以农业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专著,并在农业工业化问题上提出许多独到而精辟合理的观点,后该文被收入《哈佛经济丛书》,这本书使他蜚声于西文经济学界,也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早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工业化问题的经济学家,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1989年,张培刚写的《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一文,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第二次创新,“发展经济学之父”名至实归,也使张培刚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在全球经济学界的创新典范。

王亚南首次全译《资本论》,和郭大力用10年心血,克服重重困难,于1938年出版马克思伟大著作《资本论》三大卷全译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系统传播的里程碑。他与妻子王洛林同为传播的里程碑。他与其子王洛林同为传播的里程碑。他与其子王洛林同为传播的里程碑。他与其子王洛林同为传播的里程碑。

熊映梧始终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进行不断的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创新,是我国生产力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蒋硕杰是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1982年)。可以看出,华人是鄂籍经济学家的学术追求,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杰出人物介绍】

张培刚1934年武汉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34年毕业后即被选送到前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1941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并于一年后转入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学位,1943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哈佛期间,师从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歇尔、哈伯勒等大师,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

1946年张培刚回国,担任母校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1948年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1949年再次回国,继续在武汉大学经济系担任系主任;1951年秋至次年夏在北京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3年调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任建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公室主任;文革结束后,张培刚在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成立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主要著作:《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销》、《农业与工业化》、《新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张培刚选集》等。

王亚南(1901—1969)生于湖北省黄冈县。王亚南原本修教育,1923年大学毕业后参加北伐军。大革命失败后,王亚南流落杭州,结识了郭大力。1932年,两人合译的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问世。翻译这本西方古典经济学经典使他们一举成名。当时郭大力26岁,王亚南30岁。1935年王亚南与郭大力正式着手翻译《资本论》。1938年《资本论》三卷全译本出版,王亚南是主要译者。1945年,王亚南出任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不久厦大成为当时中国“东南学运的民主堡垒”,王亚南是其中的主将。1950年,王亚南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时,他当选为学部委员、常委。王亚南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王亚南文集》五大卷,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所走过的道路。他是一位译者丰富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首次全译《资本论》三大卷;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关于中国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首倡“中国经济学”概念。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概括王亚南的两大成就:“一是翻译《资本论》和以此作为武器研究中国;二是为厦门大学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熊映梧,湖北松滋人。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进入华北大学学习;1956—1957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师资班学习;1962—1968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研究班进修;

1978年评定为黑龙江大学经济学副教授;1982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历任黑龙江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黑龙江大学副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黑龙江省经济学会第四届会长兼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等。主要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生产力经济学概论》、《理论经济学若干问题》、《生产力经济学原理》等。

陈栋生,1935年10月出生于湖北应城市,著名区域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学术委员,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先后承担、主持了《“七五”和十年(1990—2000年)中国生产力布局战略研究》、《九十年代中国区域政策研究》、《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等国家重大课题和一系列地区发展思路与对策研究,撰写和主编了《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等十余部学术著作。

刘再兴,1926年生,湖北新洲县人。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经济地理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经济地理学会与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全国产业发展规划协会”理事、中国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他于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后长期从事经济地理、生产布局的教学科研工作,是我国区域经济的创始人之一。他1955年开始侧重于中国工业布局研究,1980年开始又侧重于研究区域经济、国土规划。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工业布局学》、《中国经济地理概论》、《生产布局学原理》、《区域经济学》、《黄土高原地区工业发展与工矿区、城市合理布局》等著作。

张晓山生于1947年10月27日。原籍湖北蕲春。是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胡风先生之子。1979年9月—1982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研究生,1982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1993年任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任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系博士生导师,1997年1月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

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7年5月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生院农业经济博士生导师;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主要著作:《中国农村改革二十年》、《中国农村新型合作组织探析》、《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等。

贾康于1954年7月出生。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在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系学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2年入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1998年,任财政部科研所完成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博士学位。1985年至今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长、所长。现任民间智库——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主要著作:《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转轨时代的执著探索——贾康财经文集》、《财政与发展》、《转轨中的财政制度变革》、《中国财政50年》、《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型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风险防范》、《世界贸易组织与财税政策》、《地方财政问题研究》、《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研究》、《我国住房改革与住房保障研究》等。

★附:鄂籍经济学家名单(排名不分前后)

黄松龄(1898—1972)
王亚南(1901—1969)
戴世光(1908—1999)
张培刚(1913—2011)
汪敬虞(1917—2012)
蒋硕杰(1918—1993)
刘再兴(1926—)
熊映梧(1929—2003)
万典武(1921—)
刘光杰(1930—)
陈栋生(1935—)
王洛林(1938—)
李善同(1944—)
张晓明(1947—)
汪同三(1948—)
贾康(1954—)
钟朋荣(1954—)
辜胜阻(1956—)
田国强(1956—)
范恒山(1957—)
左小蕾(1957—)
胡必亮(1961—)
余斌(1964—)
巴曙松(1969—)

打造 2.0 版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发展模式

■ 管益忻 教授 中国决策科学院院长、中国海内外企业家交流中心副主席 经济学家周报主编

(上接 O3 版)

9、在创新机制上,从物质创新主导价值(信息)创新主导转变。

(1)人类创新(创意)史的基本认定。

人类有史以来大致有三种创新:熊彼特创新。突出企业家文化,个别价值链,产业链内弗里曼创新。国家文化、官、产、学结合。前二种均未涉及到人的价值观加工,是以进行物质性、信息性创新为主导。然而,文化创意主导新时代到来,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既往的所谓创新转到以加工信息,研发设计进而加工价值观为“第一要务”上来了。这有三个大概率的事件发生:文化创意产业诞生并发展起来;ICT成长起来;全球化G(集团)化时代到来。

在这大时代背景下,通常语境中的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就不再光是内部比例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数据,尤其是价值观的提高和产业本身的层次升级的问题凸现出来。所以,产业升级和国民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总体来说,产业升级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价值链的攀升;第二个层面是信息(技术)的换代升级;第三是附着在信息(物质上)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的实现。

(2)ICT信息创意时代的创新特点。

这几只谈信息加工,加工价值观问题后面谈。

大数据、云计算加工的主要特点:这包括人文主导、设计蓝图、重在内容、G(集团)化、全球公司、O2O等主要特点。在时下的北京,其最大的任务是从加工物质为主向加工信息为主过渡,由“北京创造”向“北京设计”过渡成为其核心和主线。在大产业集群中,以强化企业设计,强化工业设计中心吸引国际设计机构入市;在设计价值链体系中,强化设计和创意环节的地位和作用;在互联网+涉及的所有产业企业中强化ICT的地位和作用。稍稍展开些说,便是:

其一,制造业产业链升级换代。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调整疏解非首都功能,加强工业设计的研究和应用,提升产品设计创新能力,推动“北京制造”向“北京设计”、“北京创造”转变。

其二,加强设计服务应用。鼓励和推动在京企业、科研院所建设设计创新中心,争创一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吸引国际一流设计机构来京发展。办好北京国际设计周等特色品牌活动,加快推进中关村科技园区、西城园和中国设计交易市场建设,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创发展新优势。

其三,培育制造业新业态。推动制造业企业优化在京业务布局,强化研发、设计等功能,壮大总部经济。支持服装服饰企业打造“创意设计—生产外包—内容服务”新型商业模式,推动其向智能型、服务型转变。做大做强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技术创新,鼓励实施以设计为龙头的总承包服务发展。

其四,推广新型制造模式。把握“互联网+”发展新趋势,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相结合,加快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顺应市场需求和现代生活方式,融入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强化创意设计在产。

(3)创意服务。这主要从三个基本层面来阐述。一是生产性服务;二是生活性服务;三是创意文化品质方面服务。

研究文创产业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现代服务业中的创意底蕴。从空间形态上说,现代服务业的集聚与分散可分为四个阶段来把握。先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区高度集聚;后是在郊区试探性随意分布;至三个阶段,其渐续全

面转向郊区,在郊区的交通节点上开始集聚。最后,伴随着郊区化的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在郊区形成的集聚,进一步巩固。而我们说的文创产业基本上是在沿着服务业的这一集聚发育轨迹而萌生和发展起来的。

(4)中国特色的创新。整个创新尤其是文创创新,既不是美国模式,自主创新,也不是韩国模式,或简单的我国台湾模仿创新样本。中国要搞创新驱动,我们要走第三条道路。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通过财富驱动来谋取国家或者地区的竞争力,我们觉得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注定是要下降的。

10、在产业园区打造上,从物质产业主导向创意产业主导转变。下面,着重结合潍坊、青岛、上海等产业园样本就其如何在向工业4.0过渡中从物质性产业主导向创意性产业主导转变给出解。

(1)战略主攻方向:以个性特色创意为主调。像潍坊、青岛等山东产业园区应以蓝色创意为主调,突出海洋经济——甚至从长期大战略上说更应突出中、日、韩自贸区之文化创意为主攻方向。当然从时序上讲,先培育出潍坊、山东、华东以至全球化蓝色产业链为主体内涵亦是正确的。

(2)根本战略目标:国家级(或其他高层次)创意设计示范基地。必须明了,同国家的“工业2025”之创新驱动对接,首要的是互联网+驱动,这即ICT驱动。潍坊等产业园拟定要创建为山东省首个国家级创意设计产业示范基地,成为国内首个工业4.0产业园,建设成为“山东半岛工业设计中心”产业孵化先行起步区,这就必然、必须把自己真正打造成为以信息加工产业集群为主导的园区。

(3)服务市场拓展,剑指全球化价值链。首要的当然是自己熟悉的有把握的根据地市场,如上海首抓长三角;北京主打京津冀等等。其次是打造全国化产业、经济圈,而最终当然要剑指全球价值链。

(4)基本运作方式。增量引入,存量培育。不少产业园区在力争打造国家级创意设计产业综合集聚区项目中提出“增量引入和存量培育”的运作方针和基本思路,这大体上是可行的。毫无疑问,这要具体化。

(5)重点企业企业群选定。形成以特定企业创意设计为特色,以特色创新创意设计为主干之产业集群之后,就应紧密结合市场开拓的“线路图”和“时间表”,作出重点企业的选择,以培育出是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企业群落。

(6)外溢发展产业集群。如上所说,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覆盖一切产业的产业。在文创产业敲定之后要搞好衍生产业及外层产业的安排和衔接,潍坊就同时兼及动力机械、电子信息、新能源、包装设计、现代农业等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

(7)经营知识产权。对于正在大搞创新驱动的今日中国来说,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一个重要思维转型是从保护主导向经营主导转变。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保护知识产权、推动知识产权的持续增长,更要善于经营知识产权。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成长型公司,应在这一轮产业升级的浪潮中迅速地脱颖而出。

(8)搞好“产融一体化”发展。在互联网+大环境下,文化创意产业产业园区的大发展,必须大抓、抓好货币这个第一推动力(注:马克思所言),以更加有效推动各项产业及整个园区更快的升级换代。

(本文撰于年初,6月中旬在洛杉矶中英文创产业论坛作主旨演讲,此次发表前又作一些修改)(完)